

“十大”系列丛刊



十大农民起义



王家范 主编 • 上海古籍出版社

85311 K₂₀ /
9

“十大”系列丛刊

十大农民起义



王家范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109号

“十大”系列丛刊

十大农民起义

王家范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由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75 插页 5 字数 111,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 7-5325-1399-8

K·147 定价：2.60元

前　　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约我组织编写这本小册子，作为“十大”系列丛刊中的一种。我有点踌躇。按照目前出版市场风行的趋势，这恐怕是不大会讨好的。书名无甚新奇，其内容对许多读者又几乎耳熟能详，或许时不时还会勾起当年对“起义”拔高的不悦回忆。会不会一见书名掉头就走呢？

我是这样说服自己的：历史有一种奇特的魅力。它永远不会枯竭、干瘪、衰老。不断进步着的、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只要诚心跟历史对话，总可以从这口“老井”中汲取清冽的甘泉，获取智慧的启迪。太熟悉的东西，人们往往固守成见，不愿再细加深究，这是很可惋惜的。殊不知，这恰恰会失却深化认识社会的特殊机缘。历史需要经常

温习和品味，才不致因疏忘或蔑视历史而铸成常识性的大错，饮恨无已。还有一层意思则更为深远，日臻成熟的思维智慧一定会赋予历史以新生命，发掘出许多不被前人所瞩目的新意义。

话归本题。这本书中的诸多主角，有其特殊性。他们多属芸芸众生，躬耕陇亩，在历史上原本是极不显眼的。不幸的是，他们生不逢时，遇上王朝末年的衰世，命运有点像孟老夫子所说的“天降大任于斯人”那样作弄他们，逼上绝境，而后作出了惊天动地的举动，数千年后，或者几百年后，被人们誉作农民英雄，光耀史册。

他们中相当多的人无愧于英雄的称号。卑贱者未必个个聪明。然而，本书一个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却很有说服力地证明，在卑贱者中间确实蕴藏着难以置信的智慧和才华。他们与历史上其他杰出人物相比并不逊色。如果不是这种几百年罕有的一次次历史震荡，像朱元璋、李自成这样的寒微贫穷的农家子，是不会有人相信他们会有这么精熟的政治组织、军事战略乃至舆论宣传的艺术技巧，能够指挥千军万马，组织起民众成功地推翻旧王朝这一庞然大物的。可惜的是，中国古代的专制统治体制，总是使那么多富有才华的人沉埋于黄土之中，永无见天日的机缘；一旦拨开，就立见痛苦：战火离乱，生灵涂炭，血肉厮杀。到

那时，即使像司马迁或者贾谊那样少见的、对民众举义并不反感的思想家，也为历史奇幻的一幕而惊诧，是什么竟使一群才智不过“中人”，本来极平凡、却又显得非凡的“氓隶”，创造出了素有政治、军事、文化教养的精英所不能比拟的、翻江倒海的业绩呢？

站在 20 世纪的历史高度，俯瞰本书所记述的一切，我们不能像有的史家那样，对这些英雄业绩盲目推崇，竭力拔高；即使是出于同情，也只能算作肤浅之见，无助于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是，我们更不能苟同以“落后”、“愚昧”来苛责举义者，将一幕幕历史壮剧描绘得如此灰暗，不忍一睹。即使是那些今天看来确确实实是落后、愚昧，甚至带有某些野蛮性的破坏行为，我们也没有理由因此而责难甚至否定举义造反这一事业本身的正当性。丑恶的封建剥削、专制统治制度才是造成一切罪恶的渊薮。被剥削、被压迫者基于生存的起码权利铤而走险，向现存统治体制挑战，是一种出于无奈的痛苦抉择。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实际上是选择了“死亡”，当然，这不是坐以待毙的“死”，而是站着壮烈的“死”。我们只能为他们生在那个时代而悲哀。这种悲哀，是历史的悲哀。今天的史学家，有责任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从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地域、心理等多种侧面，立体地剖

析并理解这些事件更深层的内涵，包括那些消极的东西。这比单纯的责难、嘲讽要艰难得多。

本书将要展示给读者的，将是一幕幕历史的悲剧。这不单是指绝大多数农民起义都以失败告终，即使像刘邦、朱元璋这样的成功的事例（他们至少是依托农民起义而成功的），也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更深刻的悲剧。起义者在起义时及起义之后，都怀有一种憧憬，期待通过“以暴易暴”换取一个“新天”（如“苍天”、“天国”），推行一种新“道”（如“太平道”、“替天行道”），以改变农民自身的地位。其结果呢，旧式的农民战争总是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他们充其量只能变动权力的执掌者，而权力的性质依然如故。即使是三代贫农出身的朱元璋作了皇帝，农民被剥削、被压迫的处境丝毫未能有所改变，最多只是“做稳了奴隶”。这不是一种历史的悲剧，又是什么？！

透过这一幕幕沉重的历史悲剧，我们看到一种极为辛酸的讽刺：农民起义者所企求的“天”与“道”，虽然以对抗的形式出现，却与封建统治者的“天”与“道”暗相沟通，殊途同归。还是董仲舒说得透彻：“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作更为细致的剖析，此处限于篇幅，恕不饶舌。但是，有一点也许容易被疏忽，主宰社会变动的“上帝（天）”，并

不是文化，也不是政治、军事，而是默默无声，悄然难见的经济。只要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天”不变，其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统治的“道”也难以摇撼，虽时不时震荡变更，却万变不离其宗。归根到底，社会变迁的深层动力来自经济的变迁。没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现代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生，不管是和平方式还是暴力手段，都难以抗争出一个“新天”。人类自身的解放，包括农民的解放，只有在发展经济、推动经济离开中世纪的轨道，步上新的征途，才有希望。这一点，已经为后来的历史所逐渐证实。

我有一种体验，每重读一遍历史，总会有新的感受。我无意用以上的体验去侵占读者体验的权利。只是诚恳地期待有心的读者，耐心地读一遍这本小册子，看看在你的心中会产生怎样的感受。

王家范
书于一九九二年四月底
丽娃河东侧陋室

目 录

1	前 言	王家范
1	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 ——秦末农民大起义	周时奋
22	打着“正统”旗号的反抗 ——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	周时奋
44	苍黄之战 ——东汉末黄巾大起义	周时奋
65	乱世与治世间的大潮 ——隋末农民大起义	戴松岳
84	一次未完成的远征 ——唐末农民大起义	戴松岳
101	东南的颤动 ——北宋末方腊起义	戴松岳

-
- 121 烟火熊熊呼日月
——元末农民大起义………成岳冲
- 140 辉煌的殒落
——明末农民大起义………成岳冲
- 159 向康乾盛世挑战
——清中叶白莲教大起义……成岳冲
- 179 理想与毁灭
——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朱雪芬

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

——秦末农民大起义

陈胜、吴广这两个雇农出身的戍卒，在大雨滂沱的穷乡僻壤揭竿而起，向一个庞大的帝国挑战。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轻举妄为，然而它激起了一场连锁式的全国民变。虽然陈胜没有能最终撼倒秦王朝，但他却喊出了一句足令后世记取的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戍卒揭竿大泽乡

公元前 209 年夏天，一队从嵩山脚下的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征集来的新兵，要限期开拔到 2000 里外的北边重镇渔阳换防。这个边镇位于

今北京市密云县的西南，当时正是防备匈奴入侵的前哨。与他们编队同行的还有一批阳夏的新兵。由于阳夏在阳城东面 360 里处，因此他们不得不绕道而行，进入淮河流域。

七月的淮河，正赶上汛期。南北中国的冷暖气流，在这一带的上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锋面，几乎每年在这时候，淮河的上游或下游都有几场暴雨。中国中部的这条不算太长的河流，由于汇集了从蛛网般支流倾泻而来的洪水，终于冲溢出原始的河床漫向低洼地区，直到化作汪洋一片。队伍越过阳夏正欲北上，不料遇到了一个伤脑筋的问题。连日的暴雨不但冲垮了本来并不好走的土路，而且使河水猛涨。往北，野马般奔突咆哮的古浍河挡住了前进的去路；南退，泛滥肆虐的古涡河又成为难以逾越的天堑。可能是押队的军尉，专横地要求新兵们避开洪水，缘河寻找可以渡越的津口，这支 900 人的队伍又茫然地朝东南方向行进了 400 多里，他们离渔阳越来越远了。当他们精疲力竭不得不驻扎下来的时候，已经到达了蕲县境内的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寺坡）。

大泽乡是个远离县城的穷僻乡村。粘重而略带盐碱的土地总收不到好年成，因此人口稀疏，屋舍零落。村郊那座被树木半遮着的祠庙，在浓云密布的天幕下，显得格外的阴森和神秘。队伍燃起

了一丛丛篝火。疲惫的士兵有的正烤着湿衣衫，有的已熟睡了。阳城新兵的屯长陈胜跨过狼籍相枕的士兵身体，找到了阳夏新兵的屯长吴广，借着篝火微弱的火光，两人屈指计算着路程和日期。由于错误的行军路线和暴雨造成的困难；他们已经不可能如期到达渔阳了，根据秦王朝的法律，这900名士兵都得因“失期”而斩首！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已经100余年了，当初生气勃勃的法治精神，已经衍化为机械和僵化的形式。尽管创建秦帝国的始皇帝嬴政是一位有魄力的政治家，但他不体恤民力，专横武断，使全国“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变成一座巨大的监狱。地主与农民的矛盾、现政权与被它灭亡的六国贵族复辟势力的矛盾，以及政权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已经愈益激化，犹如一堆干柴，只差一把火了。就如四十余年后的另一位政论家贾谊所评述的那样，“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戍卒失期当斩，正是“酷刑法”的一例。在此有必要提及的是，一年前，秦始皇出巡到沙丘（今河北平乡），一病而死。临终时立下遗诏，命长子扶苏继位。这时，扶苏在位于今天陕西延安的上郡监督由大将蒙恬率领的防御北方匈奴的边防部队。沙丘和都城咸阳之间有

1300 里的路程，漫长的归途足以酝酿一个成熟的政治阴谋。宰相李斯、宦官赵高出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携手拥立秦始皇的幼子胡亥，并伪造遗诏，命令扶苏自尽。不幸的是，胡亥是一个庸才，自私任性，毫无政治才干。已经在前途上潜伏了许多暗礁险滩的秦王朝航船换上了这么一个掌舵人，它的覆没就为期不远了。

篝火边，陈胜和吴广反复核计着，现在唯一的办法是逃亡。但逃亡者抓回来后还是要被处死。“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同样是死，何不为国事举起义旗，干脆轰轰烈烈地干他一场呢？陈胜和吴广的眼睛里，都闪烁着亢奋的光芒。

以区区九百之众，去向整整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挑战，这不正是螳臂挡车式的铤而走险吗？陈胜这个雇农出身的戍卒，却把握到了时代的趋势。陈胜说：“天下苦于秦的暴政已经很久了。人们好不容易看到公子扶苏是个正直人，但他又因多次进谏，反惹恼父亲，被派到边地带兵，现在又有传闻，说他无辜被二世胡亥杀害。百姓们都知道他的贤良，还不知道他死了。另外，被征服的六国，遗民并未驯服，尤其是前楚国的大将项燕，屡立战功又爱恤士卒，楚人都在怀念他，虽然有人说他死了，但也有人说他隐名逃亡了。我们要举义旗干

大事业，何不自称是公子扶苏和将军项燕的队伍，鼓动天下人都来反抗暴秦，这样做，一定会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这段精僻的分析，正是他长期来对天下大势观察的结果。陈胜虽然寄身闾左，帮人耕种，然而并不甘心于这一命运。少年时，他曾对一起当雇工的伙伴说：“苟富贵，无相忘。”要求大家一旦富贵了，要相互提携。伙伴们都笑了起来：“你不过是个帮人耕种的，怎么可能富贵呢？”陈胜长叹一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个屈身田垄的农民，怀着一颗不安份的雄心，他正悄悄地关心着国事，等待着某个可“举大计”的机会。

陈胜的见解使吴广折服。他们决定在采取行动之前，先占卜一下吉凶。占卜是当时一切重大行动决定前必要做的一件事。也许占卜的巫师已经觉察出这两个屯长正在筹划某桩重大的行动，说：“你们的计划都能实现，而且能有功名。不过，你们是否再向鬼神请教一下呢？”也许巫师的后一句话正是一种暗示，聪明的陈胜和吴广一听大喜：这不是在教我们假托鬼神，在群众中树立起威信吗？

于是，“怪事”接踵而来。押队的士兵向渔民买了一条大鱼，正准备美美吃上一顿，不料从鱼肚里竟剖出一块帛来，上面用朱丹写了令人瞠目的

三个字：“陈胜王”。白天的这桩怪事还未有谜底，入夜后，那座被树林半遮着的阴森而神秘的祠庙里，又闹起了“鬼”，远远望去，庙内竟无端出现火光，时隐时明，变幻莫测。夜风吹动时，一阵阵凄厉的狐狸叫声从祠庙那边传来，毛发悚然的士兵清晰地听到，那狐狸反复鸣叫的，竟是一句完整的人语：“大楚兴，陈胜王”。这一夜，士兵们惊恐万状，谁都感到仿佛有一种天意正降临在他们的头上。第二天一早，陈胜就觉察到人们正在他的背后指指划划，或者向他投以异样的目光。他暗暗高兴，他的第一步计划实施得很成功，因为那一连串的装神弄鬼，正是他与吴广精心设计的杰作。

吴广是个深孚众望的头领，他的话常常能影响士兵们的情绪。这天早上，吴广故意叨叨咕咕的在士兵中间煽动着：“队伍已经误期了，不如大家一起逃跑。”士兵们人心惶惶。喝得醉醺醺的尉官显然被吴广激怒了，与他争吵起来。吴广趁机用很刺激的话挑逗这个当官的，他们的周围，这时已围拢了一群七嘴八舌的新兵，陈胜夹在中间推波助澜。这使尉官恼羞不堪，扬起鞭子去抽打吴广，围观的新兵骚动了，他们向着吴广，纷纷与尉官评理。尉官大怒，从腰间拔出剑来。不料这一来更如火上加油，激发了众怒。吴广就势夺过剑来，一下刺死了尉官。陈胜和众人一起，也趁

机杀了另外的两个尉官。愤怒的新兵们这才被自己大胆的举动惊呆了。镇静的陈胜几步跨到一个高处，说：“我们已经误期了，即使赶到了渔阳也要被砍头。如果这次侥幸免死，要知道，戍边的将士十个中就有六七个死于沙场。壮士不死则已，死就要死出个名目来，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新兵们骚动着，相互疑惑地顾望着：我们这些人也能干大事？

陈胜亮开嗓门，说出了一句震聋发聩的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是何等的气派与胆识。王侯将相，难道都是天生的吗？这种对天命的大胆怀疑和挑战，成了此后中国农民起义的总宣言，也成为创造历史的中国农民自我肯定的第一次呐喊。

农民的心被拨亮了，争先恐后地呐喊着，一致拥护陈胜的决定。于是他们袒露出右臂作为统一的识别标志，又垒土成坛，放上三颗尉官的首级作为祭旗的牺牲。他们自称是“大楚”的军队，由公子扶苏和项燕所率领，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中国第一支农民武装就这样诞生了。

这支装备简陋的农民军在陈胜率领下，如决堤之水，一举攻下了大泽乡，又收集人马顺涡河东下攻克了蕲县。接着，陈胜、吴广派出符离人葛婴带兵攻取蕲县以东地区，自己则率主力向西北进